

陈 康： 论希腊哲学

商 务 印 书 馆



陈康:论希腊哲学

汪子嵩 王太庆 编

商务印书馆

1990年·北京

CHÉNKĀNG LÙN XILÀ ZHÉXUÉ

陈康: 论希腊哲学

汪子嵩 王太庆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449-7/B·44

1990年9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449 千

印数 0—1,900册

印张 18³/₄ 插页 1

(平装本) 定价: 6.65 元



作者像

编者的话

陈康先生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上西南联大的时间较晚，1943年以前他在联大讲的课程我们没有听上。1944年陈先生在重庆中央大学授课，他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于是年正式出版，这本著作使我们耳目一新，为我们打开了研究哲学史的一个新天地，启发了我们研究希腊哲学的兴趣。1945年秋至1946年春，陈先生回联大讲授“希腊哲学史”课程，并给我们领读柏拉图《国家篇》第四、第六卷的重要部分。1947年初至年底，他回北京大学任教，讲“知识论”、“柏拉图的辩证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重点讲授他的博士论文 *Das Chorismos-Problem bei Aristoteles* 一书的内容）等课程外，又给我们领读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Z、H卷。我们面聆先生教益不多，但从课堂里听到的，以及从他的著作中学到的，却深深感到陈先生教给我们的是实事求是、不尚玄虚、不取道听途说、不作穿凿附会的方法，是研究哲学史、特别是研究古典希腊哲学史的一种重要方法。研究哲学史当然可以凭学者各自的喜好选用各种不同的方法。陈先生采用的可以说基本上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传统研究古典哲学的方法，它需要深厚的学识基础和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

现在国内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以至希腊哲学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为了让大家了解这种方法，以促进和提高我们的研究，我们选编这本论文集，展现陈先生的思想和若干研究成果。

—

陈先生使用的研究方法，在1985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

版的《陈康哲学论文集》的“作者自序”中有所说明。陈先生谈到收在集子中的文章时说：

“各篇皆写于1940年至1958年之间。（1958年9月以后留居海外，因为环境关系，所有写作皆用当地文字，以便土著阅读。）1958年到现在已经二十五年，其间个人的思想，自然不能毫无变更。如若今日将各篇就原题重写，虽然每一篇不必皆和原来底稿不同，但可断言的，许多篇的前后两稿不免皆有或多或少的差别。‘假我数年’再作第三次的重写，焉知此后所写的和第二次所写的决无差别？因此内容是有变动的，也就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是构思和写作的方法。方法是比较固定的，也是主要的。数十年来思想的内容不无或多或少的变更，但是方法仍然如旧。如若读者留意这本小册子里的方法过于其中的内容，那即是适合下怀了。以下请略说这方法，先从这里所无的方法说起。比如：

无父无君的杨墨‘是禽兽也’的推论。

用于蒙混过关的‘白马非马’的分析。

在自己的意见上挂起前人的招牌（‘仲尼墨翟俱道尧舜’）。

或用前人的言论来增高自己的意见的价值（‘六经为我注脚’）。

用从半空中飞下来的结论作推论的前提（‘道曰式，曰能……’）。

打着万应灵丹的旗号，其实是空洞无内容的论断（‘方有方之理，圆有圆之理’）。

这些方法或是就幼年所读书籍中至今略存未忘的片断记忆里举隅，或是中年以后耳目偶闻偶见的事例。这些方法皆见于自先秦时期以至民国二十、三十年代的思想史里。类似的方法自然还有，此处不必求全。然而我们最不应忽略的乃是以下的方法：自从‘五四’以来，念外国书的人日多，才华超迈绝伦、不甘略受拘束的人士喜欢将糖酒油盐酱醋姜倾注于一锅，用烹调‘大杂烩’的办法来表达自己集古今中外思想大成的玄想体系。

方法的目的是应用，它不是供讲说的。讲说方法乃是对方法的回想。用方法的人回想他自己所用的方法，时常反不及旁观者所见的周详精细。以下所简略陈述见于这本小册子里的方法即是此类回想。这本小册子里的每一结论，无论肯定与否定，皆从论证推来。论证皆循步骤，不作跳跃式的进行。分析务必求其精详，以免混淆和遗漏。无论分析、推论

或下结论，皆以其对象为依归，各有它的客观基础。不作广泛空洞的断语，更避免玄虚到使人不能捉摸其意义的冥想来‘饰智惊愚’。研究前人思想时，一切皆以此人著作为根据，不以其与事理或有不符，加以曲解（不混逻辑与历史为一谈）。研究问题时，皆以事物的实况为准，不顾及任何被认为圣经贤训。总之，人我不混，物我分清。一切皆取决于研究的对象，不自作聪明，随意论断。

纵横不羁人士看到这方法的简略叙述，将要失声大笑说以下这类的话：‘陈康笨拙得可怜，智力卑劣到这样的地步，竟然在构思和写作时，处处甘受束缚，以致于吐不出一句自由解说的话来。’这个判语不但符合实情，也正是我的理想，只怕不能完全做到。然而这些人忘记了：摆脱束缚，乘兴发言，是在写抒情诗，不是做实事求是的探讨。做诗和研究，二者悬殊，它们的方法也必然不同。

读者之中想会有不是动辄跳跃飞腾，不喜欢一步一步前进的人。他们对于以上简略陈述的方法，也许感觉到兴趣，不惜予以青睐，审查这方法在各篇中的零碎应用。审查的结果或是立即抛弃，或是暂留备考。鄙视与垂青，抛弃与保留，性质各各不同，但皆是对这本小册子的反应。如若这本小册有了反应，编者的苦心和辛勤就不枉费，他们也可稍得安慰些了。如若初步同情的读者在他们以后构思和写作学术性的文章时，这本小册子里的方法能有些微的帮助，那时编者将更是心满意足了。”（《陈康哲学论文集》页二一四）

陈先生的这个希望也就是我们编辑这本书的目的。

要做到他所说的这种方法——“无论分析、推论或下结论，皆以其对象为依归，各有它的客观基础”；“研究前人思想时，一切皆以此人著作为根据，不以其与事理或有不符，加以曲解”；“总之，人我不混，物我分清，一切皆取决于研究的对象，不自作聪明，随意论断”——必须有深厚的学力。为此，需要简单介绍陈先生的经历和思想。

陈康，一名陈忠寰（Chen Chung-Hwan），江苏扬州人，1902年生。1929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原东南大学）哲学系。1929年秋至1930年夏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1930年秋起转往德国，从

Julius Stenzel 学希腊哲学,后来主要从 Nicolai Hartmann 学习。在后者指导下,于 1940 年以 *Das Chorismos-Problem bei Aristoteles* 论文取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先生以十年时间,在德国从这几位著名专家学希腊、拉丁文及希腊哲学,奠定了深厚的基础。)1940 年回国后,历任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等校教授。1948 年秋任台湾大学教授。1958 年赴美国,历任 Emory University, Montana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Post College of Long Island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Texas,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等校教授,后年老退休,留居美国。

陈先生的著作,主要是三部专著: Chen Chung-Hwan: *Das Chorismos-Problem bei Aristoteles*, Berlin, 1940; 陈康译注:《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1944 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 年北京重印; Chen Chung-Hwan: *Sophia. The Science Aristotle Sought*, Georg Olms Verlag, Hildesheim. New York, 1976。其余则是发表于国内外各种刊物上的学术论文,其中绝大部分收入本书。

陈先生在 1976 年出版的、可以说是概括了他毕生研究亚里士多德哲学成果的巨大著作 *Sophia. The Science Aristotle Sought* 一书的序言中,对他自己思想的发展作过一番简略的回顾。试译如下:

“每个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学者都可以看出这本书是在耶格尔 (W. Jaeger) 影响下产生的,虽然本书的一般结论及许多解释和耶格尔的有所不同。我要说明一下这种影响是如何形成以及这本书是如何发展成的。

本世纪三十年代尼古拉·哈特曼 (Nicolai Hartmann) 复活了本体论,并且给了它一个文字定义,这定义实际上是亚里士多德方式的德文翻译。1940 年我结束了论文 *Das Chorismos-Problem bei Aristoteles* 以后,想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作一番更一般的探讨。当时我是在哈特曼的影响之下的。我考虑的计划是将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和他

的神学分开,单独进行研究,但在进行过程中发生了不少困难。

这时候我接受了国立北京大学的聘书,它是战争时期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的一个组成单位。从‘五四’运动以来,北京大学是胡适博士领导的‘汉学’(它多少有点相当于西方的 *Altertumwissenschaft* [古学])的中心——实际上是唯一的处所。我到昆明时,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仍然存在,我以前的老师、后来的同事和朋友汤用彤教授是其领导人。这个新的学术环境恢复了我对‘古学’的兴趣。我重读了耶格尔的《亚里士多德》,进而坚信必须用他的发生方法去研究亚里士多德。结果是我从哈特曼转向了耶格尔。我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也从系统的方法转为发生的方法,研究对象也扩大为包括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和神学两个方面。

几年以后,在台湾我用学术补助费买到一批西方书籍,其中有欧文斯(Joseph Owens)的 *The Doctrine of Being in the Aristotelian Metaphysics*。这位作者的解释引起我的兴趣,但不能令我信服。这样我的研究范围就更加明确了:要从发生观点研究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和关于神的两种学说之间的关系。这就成为现在这本书的对象。

欧文斯神父的著作由于他的博学得到我的赞赏,同时也使我认识到在台湾因为缺乏足够的书籍不可能完成我的研究计划。结果是1958年我被选为中国哲学会的代表去参加意大利威尼斯举行的第十二届国际哲学会议。我原来想会后留在梵蒂冈工作,但由于语言的障碍不可能实现,所以来到美国。最初我想用六个月的时间查阅最重要的有关文献,但这是不现实的。我需要多留些时候,便接受了 Emory 大学的聘书,开始在美国教书。……(*Sophia. The Science Aristotle Sought*, pp. VII—VIII)

由此可见,陈先生的思想主要是受哈特曼和耶格尔的影响。他从这两位学者各自接受什么思想影响?本书内《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哀乃耳假也阿’和‘恩泰莱夏也阿’两个术语的意义》一文开始处,陈先生作过概要的论述。他指出: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陈先生译为“万有论”)思想被长期忽视,直到哈特曼才重新恢复这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从古代开始就被视为

一个完整的体系，直到耶格尔才开始用发生方法去研究他思想的发展变化。因此，重要的问题是用发生方法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陈先生说：

“然而从 Jaeger 门下训练出来的人未受 Hartmann 的哲学训练，虽然已能做历史方面的研究工作，但还未能认识万有论方面的问题；从 Hartmann 门下训练出来的人，未受 Jaeger 的历史研究训练，虽然已能认识万有论的问题，但仍不能做历史研究的工作。因此在二千年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史上至今还无一人从发生的观点去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万有论。现在的情形是：一方面这个研究工作正待人去做，另一方面却无适当的人才献身于这样的工作。为了不使这个无结果的僵局继续延长，以致我们忘了自己学识的浅薄，不揣谫陋地来作一个尝试。”

这项工作可以说是陈先生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所作的重要贡献。这本论文集集中的许多文章是这项研究工作的开始和若干组成部分，总的研究成果则是 1976 年出版的 *Sophia. The Science Aristotle Sought* 一书。这项工作，西方的亚里士多德研究者中还没有人做过，也就是说，陈先生的研究工作有开创意义。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对西方已经研究了二千多年的希腊哲学史），要能和西方专家一争短长，是很难能的。1944 年陈先生应当时由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要求译注《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在“序”中曾说到：

“现在或将来如若这个编译会里的产品也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昭著于全世界；否则不外乎是往雅典去表现武艺，往斯巴达去表现悲剧，无人可与之竞争，因此也表现不出自己超过他人的特长来。”（《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1982 年版第 10 页。）

虽然陈先生后来许多重要著作仍旧是用外文发表的，但是这番话却表达了我们中国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工作者应有的抱负。

二

自从 1979 年学术研究重新繁荣,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也比较受到重视时起,我们就想介绍陈先生的著作。应我们的要求,商务印书馆于 1982 年重印了陈先生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引起许多对希腊哲学有兴趣的读者们重视。同时我们就着手收集陈先生散见于各种学术刊物上的著作。主要由北京图书馆焦树安同志帮助,从馆藏书刊中找到 1940—1948 年间陈先生发表的中文著作。陈先生在中央大学时指导的研究生陈步学兄也保存了其中几篇论文,特别有价值的是《哲学自身的问题》一文中还有陈先生的几处亲笔订正。我们还找到 1940 年以前陈先生在德国留学时写的两篇中文论文:一篇是 1934 年写的《柏拉图〈曼诺篇〉中的认识论》,王太庆解放前在北京东安市场旧书摊上买到发表此文的那期《哲学评论》;另一篇是 1935 年写的《柏拉图认识论中的主体与对象》,原稿是贺麟先生在旧藏稿件中找出交给我们的;我们曾交给 1983 年出版的《外国哲学》第三辑公开发表过。这两篇陈先生早期著作的观点虽然和他后来的看法有所不同,但可以看出他在三十年代中期对柏拉图认识论的研究兴趣,以及他当时已经重视分析原著的方法,所以我们仍收入本书。

陈先生用外文发表的著作在国内很难找到。1940 年用德文发表的博士论文 *Das Chorismos-Problem bei Aristoteles*, 是请王玖兴学兄 (1945—46 年他在昆明和我们一起听过陈先生领读柏拉图《国家篇》) 去欧洲时在德国找到原书复制带回的。陈先生的好友,曾在德国和他一起从哈特曼学习过的熊伟先生发现并告诉我们若干陈先生在国外发表的论文目录,但大多发表在非常专门的学术刊物如 *Phronesis* 上,国内根本没有这种杂志。我们请在美国的王浩学兄 (1943 年他在西南联大数学系本科三年级时听过陈先生

的课)代为收集。他化了不少精力,几次从各种刊物资料中将陈先生用英文写作的论文复制寄来,共九篇,目录如下:

- 1) Plato's Theistic Teleology;
- 2) Aristotle's Theory of Substance in the *Categoriae*;
- 3) On Aristotle's two Expressions: καθ' ὑποκειμένον λέγεσθαι and ἐν ὑποκειμένῳ εἶναι;
- 4) Aristotle's Concept of Primary Substance in Book Z and H of the *Metaphysics*;
- 5) On Aristotle's *Metaphysics* K 7, 1064ⁿ 29: τοῦ ὄντος ἢ ὄν καὶ χωριστόν;
- 6) Different Meanings of the term *Energeia* in the Philosophy of Aristotle;
- 7) Aristotle's Analysis of Change and Plato's Theory of Transcendent Ideas;
- 8) From Plato's Receptacle to Aristotle's Matter;
- 9) Universal Concrete — A Typical Aristotelian Duplication of Reality.

虽然这些还不是陈先生用英文写的论文全部,但重要著作基本上已经有了。1986年王浩师兄还将陈先生的专著 *Sophia. The Science Aristotle Sought* 一书复制寄来。由于他的帮助,我们得到了陈先生的几乎全部英文著作。

1985年王浩师兄就告诉我们:听说台湾已经出版《陈康哲学论文集》。1986年他将由江日新、关子尹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原书寄来;后来我们又托其他友人在香港买到几本。这本书将他们所能收集到的1940—1958年间陈先生写的中文著作全部编入,其中一部分是他去美国前留在台湾友人处还没有发表过的原稿。这样,1948—1958这十年间陈先生写的中文著作我们都看到了。

经过七、八年时间,陈先生的中外文著作我们大体已经收集齐

了。除了两本专著: *Das Chorismos-Problem bei Aristoteles* 和 *Sophia. The Science Aristotle Sought* 需要化大力翻译, 我们想在有生之年争取翻译出版外, 其他的论文也可以编印成集了。这样, 我们决定编辑这本文集。

我们是怎么考虑编辑这本书的? 有几点需要说明:

第一, 陈先生主要是一位哲学史家, 希腊哲学史专家, 但同时又是一位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接受尼古拉·哈特曼 (从新康德主义者转变为批判的实在论者) 的影响。陈先生在四十一五十年代曾发表过几篇谈哲学问题的论文。本书中《尼古拉·哈特曼》一文, 可以看出他刚回国时对哈特曼感情之深。但正如他自己所说, 后来从哈特曼转向耶格尔, 就以全力从事希腊哲学主要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了。他的哲学思想当然指导他的哲学史研究, 我们从他的哲学史研究中看出他的哲学思想。比如, 他很重视分析的方法, 收入本书的最后三篇文章都是他作具体分析的实例, 可以看出他分析的细致精密; 他对希腊哲学史的研究, 经常采用这样精细的分析方法。但是, 他的研究主要是根据原著材料, 不以某种学说为经典。收入本书的极大部分是他研究希腊哲学的著作, 因此将书名定为《论希腊哲学》, 而将他关于一般哲学问题的论文作为一个部分, 列在后面。

第二, 这是一本学术论文集, 因而我们将一些学术内容较少的文章 (这在陈先生的著作中是极少数) 没有收入。从学术观点看, 陈先生有些中文著作当然是很重要的, 但 1958 年以后他写的那些英文著作更能表现他所自述的方法的运用, 也更能表现他的学术功力, 所以我们将这九篇文章全部译成中文, 收入本书。本书有些文章的写作年代难以查清, 所以未按写作年代编排, 而按学术内容编排次序。

第三, 在希腊哲学中, 陈先生特别在中后期主要精力集中在研

究亚里士多德哲学，但他对柏拉图哲学也是作了深刻研究的。他的博士论文研究亚里士多德论分离问题，实际上就是讨论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有关普遍和特殊、亦即一般和个别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从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兼及认识论）思想。陈先生研究柏拉图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独创性地解释了柏拉图最难懂的对话《巴曼尼得斯篇》，这方面的思想见于他对这篇对话的译注专著。我们将 1981 年王太庆由德文原著译出的《论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一文，以及陈先生作为该书附录的《“少年苏格拉底”的“相论”考》也收入本书，和其他两篇文章一起，读者可以由此看出他在这一方面的主要思想。《柏拉图的有神目的论》一文，将柏拉图的本体论思想和神学思想合并研究，可以代表陈先生后期的研究方向，在本书所收文章中还是不多见的。在陈先生著作中，阐述柏拉图哲学思想的远不如阐述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那么多而完全，但他对柏拉图哲学原来是有比较完整的看法的。为此，我们将当年听陈先生讲课时由汪子嵩记录的两段笔记加以整理收入本书。一段是 1945 年秋在西南联大讲“希腊哲学史”课时，对柏拉图的哲学方法、“相”以及“相”和个别事物的关系等问题所作的概述。另一段是 1947 年春夏在北京大学讲“柏拉图的辩证法”课时，对《费都篇》、《国家篇》以及《巴曼尼得斯篇》、《哲人篇》这四篇对话的主要内容及它们的发展关系所作的综合分析。这些笔记多少可以表现陈先生的讲课风格，也许可以帮助读者比较通俗地学习和理解柏拉图的哲学。

（附带提到：王浩学兄对于陈先生讲的“知识论”课程内容很感兴趣，几次建议我们将这部分笔记整理出来。可惜我们手头保存的笔记已经不全，无法整理，希望将来有当年听过陈先生这门课程并还保存笔记的同学能和我们一起来完成这项工作。）

陈先生从发生观点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思想，从本书收

入的文章可以看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关于 Substance (陈先生译为“本质”,一般译为“本体”或“实体”)的问题,另一个是关于“现实”和“潜能”的问题。在他后期专著 *Sophia. The Science Aristotle Sought* 书中,对这些问题 就有更系统的完整看法了。

最后,关于本书的编辑工作,特别是翻译陈先生的外文著作的有些技术问题,还需要作些说明。

陈先生的中文著作,除上述有他亲笔订正的《哲学自身的问题》一文按订正作了一些改动外,其余均照原来的文字排印。他的文章中常杂有各种外文,也都保存原样,仅只对一些明显印错的文字和标点作了改动。陈先生 1947 年在《学原》发表的《柏拉图〈国家篇〉中的教育思想》一文,《陈康哲学论文集》根据作者手稿改为《希腊教育思想》。我们将两篇文章对照看了一下,主要内容和文字基本相同;后一篇比前一篇稍为增添了一些内容,特别是增加了详细的注释。我们考虑,这篇文章主要讲的实际上是《国家篇》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思想(也就是 1945—1946 年陈先生在西南联大给我们领读《国家篇》时讲的主要内容),所以仍采用原来的题目——《柏拉图〈国家篇〉中的教育思想》,将《希腊教育思想》一文中增添的内容和注释补充进去。

陈先生一贯认为用中国文字翻译希腊哲学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为此他努力作了许多尝试,并创造了一些翻译术语。比如,柏拉图的 *Theory of Ideas*, 他多处均译为“相论”,但在手稿《柏拉图》一文中,他却主张译为“形论”,可见对这个译词他一直还在斟酌之中。他用的译词有些已被一般采用,有些却和一般译法不同。比如亚里士多德的 *Metaphysica* 一书,一般均译为《形而上学》,他译为《物理学以后诸篇》。又如 *Ontology* 一词,他原来音译为“翁陀罗己”,在《尼古拉·哈特曼》一文的注释中专门作了解释;但

在以后的著作中他也采用“万有论”的译法，而我们现在却译为“本体论”。凡属这类情况，在陈先生的中文著作中我们都保留他原来的译法，而在我们翻译他的外文著作时，为了照顾读者的习惯，却都采用通常的译法。这种情况在《从发生观点研究亚里士多德本质论中的基本本质问题》一文中出现的问题最多。该文所说的“本质”即 Substance，通常都译为“本体”或“实体”，所说的“基本本质”和“次级本质”，即通常译为“第一本体”和“第二本体”的；而通常译为“本质”的 essence，他译为“本性”，通常译为“存在”的 being，他译为“存有”，有时译为“有”或“是”（在有些文章中，他写的是德文 Sein，并音译为“洒殷”）。凡属这类译词，在陈先生写的中文论文中均保留他原来的译法，我们翻译时均采用通常的译法。还有一些陈先生创造的术语，虽然未为一般采用，但读者比较容易理解的，我们仍采用他的译法，如 idea 或 eidos 译为“相”而不译为“理念”，Sophist 译为“哲人”而不译为“智者”等等。这类术语，在本书中不采用统一的译词，一方面是想让读者了解陈先生自己的译法，同时又照顾到读者的习惯用法。希腊人名和地名翻译，无论原来的中文著作和我们的译文，一般都改为现在通常使用的译名，如 Theaetetus 均作“泰阿泰德”而不按陈先生的译名“苔耳业苔陶斯”或“齐哀提特斯”，Zeno 译为“芝诺”而不作“齐诺”。但有些译名虽然未被一般采用但已为一般读者所熟悉的，我们仍采用他的译名，如 Parmenides 作“巴曼尼得斯”而不作“巴曼尼德”，Phaedo 作“费都”而不作“斐多”，Meno 作“曼诺”而不作“美诺”等。陈先生著作中常有希腊、拉丁、英、德、法等文字的整段引文或短语、单词，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们尽可能在引用的外文后面附上中文翻译，这类翻译均以方括号([……])标明。

本书能够编成出版，首先要感谢王浩学兄从海外为我们收集了许多国内无法找到的资料，还要感谢当年曾在德国先后和陈先

生同学过的贺麟、熊伟、胡世华先生，还有王玖兴师兄和四十年代陈先生在中央大学指导的研究生苗力田、陈步二师兄，以及商务印书馆的高崧、武维琴、吴儂深等同志，由于他们的热情支持，我们才能完成这项工作。

汪子嵩 王太庆

1987年3月